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开元时期，唐玄宗的形象 ——以史传及唐五代笔记小说为例

科目编号：ULSZ 3078

学生姓名：刘晓惠

学位名称：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老师：余曆雄 师

呈交日期：2014 年 8 月 15 日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	1
第二节	前人研究概况	2
第三节	资料搜集	3
第四节	研究方法	4
第五节	研究难题	5
第二章	新旧《唐书》中的唐玄宗	6
第一节	青少年时期	8
第二节	开元时期	11
第三节	天宝时期	14
第三章	唐玄宗知人善任的形象	17
第一节	“蝗虫事件”	17
第二节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20

第四章	唐玄宗励精图治的形象	25
第一节	“节俭治国”	25
第二节	“废寝忘食”	28
结论		33
参考文献		35

开元时期，唐玄宗的形象
——以史传及唐五代笔记小说为例

宣誓

谨此宣誓：本论文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所引用的资料或参考他人的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资料，皆已在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细的列出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

日期：

摘要

本论文所讨论的对象是唐朝皇帝唐玄宗。唐玄宗（685-762）在位四十四年，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也是有极多争议的一位皇帝。他在位之时，做了足以改变历史的几件大事，这些事件分别发生在唐玄宗的不同时期，即青少年时期、开元时期与天宝时期。尽管历代学者对唐玄宗的形象皆有涉猎，但多着重于玄宗朝后两个时期的政治以及当时的社会层面，侧重于唐玄宗的形象。今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从玄宗的形象切入，对当时的政治社会进行探讨，而是通过新旧《唐书》与唐五代笔记小说中对唐玄宗形象的相关记载，互相辩证当中的叙述，以便挖掘唐玄宗在开元时期的真正形象。

首先，论文的绪论部分将会对有关的前人研究做一个简单整理，从而阐明研究动机和目的。另外，对于资料的搜集以及研究方法和步骤，和研究难题，亦同时在此交代，以使研究方向更为明晰。

其次，为了便于之后两章叙述唐玄宗于开元时期的形象，第二章将会针对新旧《唐书》中唐玄宗的形象做一个整体的概述。第一节将叙述唐玄宗青少年时期的形象，第二节叙述开元时期及第三节叙述天宝时期。由这三个时期的叙述，将清楚了解唐玄宗在史传中的整体形象，并窥探两《唐书》对玄宗形象叙述的差异点及其形成缘由。

第三章将通过唐五代笔记小说的记载与史传中的唐玄宗辩证开元时期所发生的两件事情，即“蝗虫事件”及“用人不疑”事件探讨唐玄宗知人善任的形象。第

四章则比照办理，以“节俭治国”及“废寝忘食”两个事件探讨唐玄宗励精图治的形象。经过互相辩证官方及非官方的记载，探讨当中的关联性及可信度，最终得出此一形象虽经历嬗变，却不影响整体形象走向的结论。

综合所论，可知两《唐书》虽被撰写目的与撰写环境所限制，整体上并不离历史事实。而唐五代笔记小说虽缺乏正统地位，内容有所偏离及有夸大、虚构之嫌疑的问题所在，却不失为探讨玄宗形象的另一条途径。经过两者的互相辩证，梳理史料源头，笔者亦得出了此形象并非经后天塑造而成，而是唐玄宗本身真正的形象。此一形象的奠定成为后来者的依据，发展出各种作品集，将此一人物流传至今。如能以此为起点，探讨历朝以来唐玄宗形象的嬗变，相信会更具意义。

致谢

一开始拟定这个题目时，本人非常担忧，因为毕竟是牵涉古代文言文，在理解和掌握上始终没有现代语言来得容易。在本论文的指导老师余曆雄老师的“加持”下，得以顺利完成。在此特别感谢余老师的细心指导，尤其是论文所必需具备的方法论，让笔者受益不浅。在与老师的讨论过程中，老师始终乐于分享其学术心得，除了提供笔者开拓性的意见外，其研究的严谨态度与实事求是的精神，给予本人无尽的启迪。

其次，感谢父母与哥哥们在本人撰写论文的过程中给予的包容、支持与鼓励，尤其是已离开人世的婆婆。虽然她无法与本人分享完成论文的喜悦，无疑是遗憾，但她临终不忘给予本人的鼓励，是推动本人完成论文最大的动力，在这里致万二分的感激。希望她在天国能够见证一切。

再者，感谢给予本人帮助的同窗们，尤其是淑娴、纤奴及品善。感谢你们愿意给予建议，并帮助我厘清盲点、无时无刻听我的牢骚和鼓励我坚持下去。此外，感谢给予我鼓励的朋友们，你们的关心，让处在水深火热的我倍感窝心。

最后，本人及本论文有赖于身边师长与亲友的协助与鼎力支持。于此，本人顿首致谢。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

唐玄宗（685-762）在位四十四年，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也是有极多争议的一位皇帝。唐玄宗在执政期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成为皇帝之前的青少年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刚执政的开元时期，第三个时期是步入晚年的天宝时期。

这三个时期之所以能够那么明确地区分开来，原因在于这三个时期都发生了一些足以改变历史的重大事件。如青少年时期，唐玄宗成功从韦后手中夺回政权，重新确立巩固李唐的天下，而开元时期的繁荣产生了后人称颂的“开元之治”。天宝时期则发生了后人所称的“安史之乱”事件，是导致唐朝走向衰落的关键点。这三个时期的唐玄宗在这些历史事件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故此，时人及后人欲探讨此三个时期尤其是天宝时期之政治嬗变事件，多视唐玄宗为根本因素，并将其形象转变为研究此论题的切入点。

唐玄宗青少年时期之形象，虽史料鲜少，但此时他的形象却都得到各界统一认可。而后对于唐玄宗开元时期及其以后形象转变的论述及评价，不论是正史抑或唐五代私家编撰的笔记小说都不尽相同。即使是官修正史的史传——新旧《唐书》对玄宗的评价也不一致：《旧唐书》认为天宝后“小人道长”是基于唐玄宗“用人之失”之错（刘昫等撰，1975:237）；《新唐书》则认为唐玄宗错在“女祸”，为玄宗扣上贪恋女色的罪名。（欧阳修、宋祁撰，1975:154）虽唐玄宗之形象各史记载

不一，却都一致将其形象归为开元与天宝时期政治嬗变的主要因素。于此笔者将从史传及唐五代笔记小说切入，尝试梳理唐玄宗在开元时期的形象论述，并从中探讨出唐玄宗在史传与笔记小说中形象之关联及其缘由。

第二节 前人研究概况

纵观唐朝，除了开国皇帝唐太宗、史上第一位女皇帝武则天，谈论得最为广泛的便是唐玄宗。他在前期以及后期的形象和政治手段可谓判若两人。也是因为他，将唐朝推至繁荣的景象，史称“开元之治”。而在后期却因为“安史之乱”事件将唐朝带向衰败之路。唐朝因唐玄宗可谓历经波折。

《二十世纪唐研究》认为，历代以来的学者多将重点放在唐太宗的身上，而玄宗朝政治的研究状况少有涉足，多是浮光掠影的概述，直到二十世纪才渐有学者专注于玄宗政治的研究，包括陈寅恪，香港的黄约瑟等，从此逐渐有更多的学者对玄宗的多个问题展开论述。（胡戟等主编，2002：43-44）为唐玄宗作传的学者，在《唐明皇传》的前言就点名此书专注于探讨开元、天宝由盛而衰的原因，希望透过唐玄宗来探索隐藏在历史现象背后的阶级关系和客观规律，从而做出系统性的分析。（袁英光、王界云，1987:1）《唐玄宗传》的作者也在本书中强调，此书着重探讨唐玄宗之所以成为盛唐君主的社会条件，揭示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生活的历史缘由。（许道勋、赵克尧，1995:2）

历代学者的研究，多着重于唐玄宗时期的政治以及当时的社会层面，侧重于唐玄宗的形象。或者由唐玄宗的形象作为切入点，探讨当时形成的原因及背后意义。如在开元时期，唐玄宗的用人是得到学者们的青睐的。吕思勉在《隋唐五代史》中对姚崇宋璟等贤相给予肯定，也认为玄宗所选择的宰相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政治，形成开元之治的景象。（胡戟等主编，2002：44）从中只能窥见唐玄宗的形象，并没有重点论述。

由于唐朝注重撰史，成为一时的风气，间接也使笔记小说兴盛起来。（周勋初著，2000:12）许多在朝为官的学者纷纷提笔撰写笔记小说，为的是“补史之阙”。（王珂，2007:14）因此，唐朝皇帝的事迹多能在笔记小说中寻找，尤其是唐玄宗。由此便衍生出一些疑问：唐五代笔记小说早于新旧《唐书》面世，新旧《唐书》是否参考了笔记小说的内容？笔记小说中的内容是否可信？这是学者们比较少探讨的方向。

第三节 资料搜集

笔者经指导老师指点，并经历一番查找工作，得以列出此论文所需要的原典古籍、参考专书及期刊论文。

由于本论文以史传及唐五代笔记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所需古籍免不了就是新旧《唐书》，及唐五代笔记小说。其中较多引用的是《开天传信记》、《次柳氏

旧闻》、《大唐新语》、《明皇杂录》等。作为辅助的笔记小说有《开元天宝遗事》、《松窗杂录》等。

至于参考专书，则有周勋初的《唐代笔记小说叙录》，严杰的《唐五代笔记考论》，各个《隋唐五代史》等。通过以上学者对唐五代笔记小说的考证结果，及隋唐五代史的背景为本论文提供专业的证据证明笔记小说的来源及可信度，使本论文的论点及论述更为可靠。

此外，笔者也沿用了近代学者的期刊论文，以增强本论文的论点。包括《有关唐玄宗的三种杂记考述》、《唐五代论开天兴衰》、《唐玄宗类型小说的三种模式及其演变特点》等。以上资料极为宝贵，笔者有幸沿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对本论文有极大的帮助，使本论文的论点得以发挥得更完全。

第四节 研究方法

本论文主要参考的史籍为《旧唐书》、《新唐书》及唐五代所著的笔记小说。在论述过程中，先整理史籍中唐玄宗在三个时期的形象，然后将开元时期所发生的四件事与笔记小说对照，事件包括“蝗虫事件”、“用人不疑”、“节俭治国”及“废寝忘食”，以便了解史籍及笔记小说对唐玄宗形象的异同点，并藉此深入探讨其缘由。

笔者确定研究方向后，先尝试理解“笔记小说”的定义。经过一番查找，从周勋初的《唐人笔记小说考索》及侯忠义著的《隋唐五代小说史》了解何为笔记小说

以及唐五代笔记小说的特点。其次，必须了解掌握新旧《唐书》中关于唐玄宗的记载，及对唐五代笔记小说的类型有基本的掌握。

笔者通过《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唐人轶事汇编》等专业工具书的检索，除帮助笔者在搜集资料方面确保无遗漏之外，也帮助笔者厘清重点。此类工具书确实发挥了极大的功能。

第五节 研究难题

由于笔者在此论文之前，并没有接触过古代研究，更没有接受过相关训练，因此在确定题目后即遇到种种困难，一度使笔者裹足不前。

在开始动笔撰写本论文前，所要做的工作便是收集资料。在查找资料之时，面对浩瀚式的图书馆，竟一时不知从何下手。经过一段时间，总算找到几本关于唐代笔记小说的历史，从中也发现了几本貌似能用的笔记小说。接着再翻找笔记小说的书籍，发现很多本在图书馆里都不见踪迹。幸得在网上查询资料时发现图书馆藏有《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才将此难题解决。

接下来，是阅读原典古籍。唐代的原典古籍，无论是新旧《唐书》还是笔记小说，都是文言文。虽说笔者身处于中文系，但接触文言文的机会相对现代汉语来说并不多，在理解方面增加了困难度。笔者经过一段长时间的阅读和消化，并上网查询资料和翻译，总算能够稍微掌握当中的记述和要点。

此外，笔者和指导老师讨论后，发现笔者在收集资料方面有许多不足的地方，恐会遗漏重要的文献资料。由于笔者在文献的掌握上并没有得到相关的训练，更欠缺方式，一时也不知该如何是好。经过指导老师的指教，提供两本工具书，使收集资料的工作能够更完善。

第二章 新旧《唐书》中的唐玄宗

新旧《唐书》乃记录唐代历史的两本史籍。《旧唐书》由五代后晋刘昫等史官所撰，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因后来北宋欧阳修、宋祁等人编撰《新唐书》，为作区别，故有新旧之称呼。经过笔者分析，新旧《唐书》是有本质上的差别的，大约可分为三个部分：详略之别、史观之别及内容之别。

	青少年时期	开元时期	天宝时期
旧唐书	12.15%	54.7%	33.15%
新唐书	4.5%	57.7%	37.8%

经笔者统计，《旧唐书》的《玄宗本纪》分为上下册，字数共 30629 字。唐玄宗的三个时期即青少年时期，字数共 3711 字，占本纪 12.15% 的篇幅。开元时期则有 16766 字，比例则为 54.7%。而天宝时期是 10152 字，占 33.15%。《新唐书》的《玄宗本纪》字数为 11522 字，青少年时期的总字数为 518 字，只占总篇幅 4.5%

而已。开元时期则有 6649 字，占有全篇幅 57.7%之多。天宝时期为 4355 字，占了 37.8%而已。两唐书的字数就有明显的悬殊，《新唐书》的字数竟少《旧唐书》接近三倍之多。由此，当中的比例并不是从两唐书之间的对比，而是两唐书内部的对比。以上能够看出两唐书都着重于开元时期的记载，分别是《旧唐书》的 54.7%及《新唐书》的 57.7%。反而是青少年时期只占《旧唐书》12.15%及《新唐书》的 4.5%而已。

唐玄宗的形象不仅出现于本纪，当中有某一部分是出现于列传当中，新旧《唐书》皆如此，尤其是玄宗时期重要的贤相，出现的次数是更频密的。如新旧《唐书》的《姚崇列传》。在《旧唐书》，《姚崇列传》的字数为 4391 字，当中玄宗出现的事件便有五条之多。而《新唐书》的姚崇列传字数为 4073 字，玄宗的条目也是有五条。无论是《旧唐书》，还是从简的《新唐书》在列传的字数都不相上下，玄宗出现的次数更是相同，不同之处在于两唐书所记载的事件不尽相同。

由此可见，新旧《唐书》的详略之别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新唐书》虽简略了《本纪》，却没有简略《列传》，可以说明《新唐书》着重于《列传》多于《本纪》，尤其是忠良之人的传，以便进行“忠奸顺逆”的褒贬之目的。（欧阳修、宋祁撰，1975:3）

笔者将从唐玄宗的三个不同时期中的几件重要事件进行讨论，包括青少年时唐玄宗从韦后手中夺回政权事件、睿宗立玄宗为皇太子事件，开元时期的勤奋表现、蝗虫事件及天宝时期的奢侈和贪乐事件。期望从这些事件中，探讨出唐玄宗在新旧《唐书》的着重点之异同及其缘由。

第一节 青少年时期

上面已经说过，对于唐玄宗青少年时期的形象，新旧《唐书》中的记载并不多。这不仅在正史中，在现存的笔记小说中也难得找到相关记载。那么在篇幅极少的记载中，是否有很大的出入？两本正史都从唐玄宗的身世着手，并列明唐玄宗在年轻时的封号。《旧唐书》的《玄宗本纪上》记载：“唐玄宗于三年闰七月丁卯，封楚王。于长寿二年腊月丁卯，该封临淄郡王。并在神龙元年，迁卫尉少卿。景龙二年四月，兼潞州别驾。（刘昫等撰，1975：165）而在《新唐书》的《玄宗本纪》中仅记载：“始封楚王，后为临淄郡王。累迁卫尉少卿。潞州别驾。”（欧阳修、宋祁撰，1975：121）《新唐书》和《旧唐书》的记载无本质上的差别，可《新唐书》并没有交代时间，仅以极短的字数交代唐玄宗所得的封号。

唐玄宗于青少年时期，韦后企图效仿武则天意欲自称为帝。当时唐玄宗年少气盛，颇有抱负，意欲铲除韦后势力，以正朝纲。此一事件均有记载于正史中。《旧唐书》云：

上（玄宗）益自负，乃与太平公主谋之，公主喜，以子崇简从。上乃与崇简、朝邑尉刘幽求、长上折冲麻嗣宗、押万骑果毅葛福顺李仙凫、宝昌寺僧普润等定策诛之。或曰：“先启大王。”上曰：“我拯社稷之危，赴君父之急，事成福归于宗社，不成身死于忠孝，安可先请，忧怖大王乎！若请而从，是王与危事；请而不从，则吾计失矣。”（刘昫等撰，1975：166）

玄宗密谋从韦后手中夺回政权的事件中，《新唐书》的记载和《旧唐书》的不相上下，只是明显简略了。此外，当中参谋的人也不尽相同。除了两篇都有提到的崇简、刘幽求、麻嗣宗、葛福顺、李仙凫和僧普润外，《新唐书》还增了王师虔、钟绍京和道士冯处澄。而《旧唐书》对玄宗的回答，与《新唐书》对比发现，《新唐书》明显简略。《新唐书》仅曰：“请而从，是王与危事；不从，则吾计失矣。”（欧阳修、宋祁撰，1975:121）明显是经过一番润饰，显得简洁有力。

在这一时期，还有一处事迹是差别颇大的，就是睿宗即位之时，立玄宗为皇太子一事。在《新唐书》中，关于此事，只记“睿宗即位，立为皇太子”。（欧阳修、宋祁撰，1975：121）而《旧唐书》则不然，文中云：

睿宗即位，与侍臣议立皇太子，金曰：“除天下之祸者，享天下之福；拯天下之危者，受天下之安。平王有圣德，定天下，又闻成器已下咸有推让，宜膺主鬯，以副群心。”睿宗从之。丙午，制曰：“舜去四凶而功格天地，武有七德而戡定黎人，故知有大勋者必受神明之福，仗高义者比为匕鬯之主。朕恭临宝位，亭育寰区，以万物之心为心，以兆人之命为命。虽承继之道，咸以冢嫡居尊；而无私之怀，必推功业为首。然后可保安社稷，永奉宗祧。第三子平王基孝而克忠，义而能勇。比以朕居藩邸，虔守国彝，贵戚中人，都无引接。群邪害正，凶党实繁，利口巧言，馋说罔极。韦温、延秀，朋党竞起；晋卿、楚客，交构其间。潜结回邪，排挤端善，潜贮兵甲，将害朕躬。基密闻其期，先难奋发，推身鞠弭，众应如归，呼吸之间，凶渠殄灭。安七庙于几坠，拯群臣于将殒。方舜之功过四，比武之德逾七。灵祇忘在，昆弟

乐推。一人元良，万邦以定。为副君者，非此而谁？可立为皇太子。有司择日，备礼册命。（刘昫等撰，1975：167）

《新唐书》仅以一言交代玄宗被立为皇太子一事，而《旧唐书》将睿宗与侍臣商讨立太子一事到诏书，都完整地记载在《玄宗本纪》上。以上的两件事在唐五代笔记小说中是不见踪迹的，可见以上事件的资料来源不是唐五代笔记小说。而经赵翼考证，《旧唐书》的史料来源为国史，甚至考证出《旧唐书》前半部全用实录国史旧本。（赵翼撰、王树民校证，2005：345）《旧唐书》撰于五代后晋，与唐朝相隔不久，能够得到唐朝国史的资料，是合理的。况且在《旧唐书·职官志》中就有说到唐朝注重修史，文曰：“历代史官，隶秘书省著作局，皆著作郎掌修国史。武德因隋旧制。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始移史官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刘昫等撰，1975：1852）后晋的人不仅因时间关系容易得到国史，也是因为唐朝注重国史的修撰，并且郑重保存起来的缘故。

由于笔记小说对这两件事都没有记载，因此笔者推断《新唐书》在这两件事的记述上，是参考《旧唐书》而得出的。而《新唐书》为与《旧唐书》切割开来，所以在记述上，有明显的差异，如删去《旧唐书》所记载的诏令内容，或在《旧唐书》的基础上，增加《旧唐书》所没有的内容的。这在密谋事件当中，密谋的对象就可以证实。

第二节 开元时期

唐玄宗在开元时期，“知人善任”及“励精图治”是代表玄宗最好的形象。在新旧《唐书》中，都有关于此类的记述。在笔记小说中，这一时期的描绘更是丰富。关于笔记小说的部分，笔者将留待其他章节论述，在此将着重于新旧《唐书》的部分。经过笔者的梳理，发现新旧《唐书》针对唐玄宗这一时期的记述，有些事件或者内容是《新唐书》不复见的，或者《新唐书》增加了《旧唐书》所没有的内容。例如《旧唐书》云：

冬十月甲寅，制曰：“朕听政之暇，常览史籍，事关理道，实所留心，中有阙疑，时须质问。宜选耆儒博学一人，每日入内侍读。”以光禄卿马怀素为左善骑常侍，与右散骑常侍褚无量并充侍读。（刘昫等撰，1975：175）

唐玄宗孜孜不倦的形象，在《新唐书》中是不见踪迹的。彭菊媛认为《新唐书》采用《春秋》笔法和删略《旧唐书》的现象，最为明显地反映在本纪部分。（彭菊媛，2008：14）从这一角度看，的确如此。《新唐书》除了谨遵《春秋笔法》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意与《旧唐书》不同。王鸣盛也指出：“《新纪》减字缩句，专尚简严，且其立意务欲与《旧书》违异。”（王鸣盛，2005：598）笔者认为，这个评价过于斩钉截铁。《新唐书》固然有意与《旧唐书》违异，但也有与《旧唐书》相同的地方。崔群认为：“开元二十五年罢贤相张九龄，专任李林甫，理乱自此已分矣。”（刘昫等撰，1975：4189）这里的理乱自然是指玄宗朝的开元及天宝时期，而《新唐书》也承袭了崔群的这一观点。（谢保成著，2007：404）《新唐书》并没有似《旧唐书》般将《玄宗本纪》分为上下册，但细读内容也可看出《新

唐书》对此一观点的接纳。所以两《唐书》是有违异之处，却也有相同点，因此不该过于武断。

两书都有记载的，莫过于《旧唐书》的“内出珠玉锦绣等服完，又令于正殿前焚之”（刘昫等撰，1975：173）及《新唐书》的“焚锦绣珠玉于前殿。”《新唐书》还提及“焚采珠玉及为刻镂器玩、珠绳帖绶服者，废织锦坊。”（欧阳修、宋祁撰，1975：123）后面的记述反而是在《旧唐书》中没有记载。乍看之下，《新唐书》似有意与《旧唐书》违异，可笔者推断，唐玄宗不仅“焚锦绣珠玉于前殿”，也“焚采珠玉及为刻镂器玩、珠绳帖绶服者，废织锦坊”。这意味着，唐玄宗的此举动，不仅一次而已，而是在开元时期中，发生过几次。《新唐书》在这一方面，补强了《旧唐书》的不足。

至于“蝗虫事件”，两书都有相关记载。《旧唐书》云：

六月，山东诸州大蝗，飞则蔽景，下则食苗稼，声如风雨。紫微令姚崇奏请差御史下诸道，促官吏遣人驱扑焚瘞，以救庄稼，从之。是岁，田收有获，人不甚饥。（刘昫等撰，1975：175）

《新唐书》的《玄宗本纪》对此事并没有记载，反而记载于《姚崇列传》，而《旧唐书》的《姚崇列传》也有相关记载。两书中的《姚崇列传》对于此事的记述大致相同，可以说明两书都用以传记史的方式，将此事收录于列传。由此一来，《旧唐书》的《玄宗本纪》又记载此事，不免显得累赘。但是《旧唐书》的记载也有它史料的价值在。黄永年也认为：“史书能够越多越详细，并尽量保持原样，这是最好的状态。”（黄永年，1985:49）

此外，《新唐书》的《姚崇传》记载了《旧唐书》没有记载的一段史实，文中云：

崇尝于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顾，不主其语。崇惧，再三言之，卒不答，崇趋出。内侍高力士曰：“陛下新即位，宜与大臣裁可否。今崇及言，陛下不应，非虚怀纳谏者。”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当与决，至用郎吏，崇顾不能而重烦我耶？”崇闻乃安。由是进贤退不肖而天下治。（欧阳修、宋祁撰，1975：4384）

这段讲述玄宗“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典故，在《旧唐书》却不复见，不禁让人感到奇怪。这一件事，《旧唐书》没有记载，这是否就能够证明吴缜的批评，认为《新唐书》多是取材于唐人的笔记小说，而当中所记载的历史事实是不可信的。（吴缜撰，2005:4）暂且不论此条目是否参考了笔记小说，《新唐书》的此番做法，足以证明有意违异。此外，《新唐书》有新增史料，也是有迹可循的。因此，唐凤霞也认为：“从保存原始史料上，《旧唐书》胜《新唐书》。但《新唐书》也有新增之处。”（唐凤霞，2006:14）这说明《新唐书》是以《旧唐书》为基础，却意图超越《旧唐书》，以完善《旧唐书》的不足。因此，《新唐书》的有意违异，并不是单纯地有意违异，而是有更深刻及有意义的因素在内。

第三节 天宝时期

天宝期间发生了著名的“安史之乱”，是唐代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因此两《唐书》都非常着重于这一时期的史实。经过统计，在这一时期的比例，两唐书就占了 35%左右，虽然不比开元时期高，但以开元和天宝的长短计，占的比例非常大。开元期共二十八年，天宝期不过十四年，是开元期的一半而已。由此，笔者认为，两唐书的史实都着重于玄宗的这个时期。

唐玄宗这一时期可谓被定型于沉迷声色。但这一形象大多都仅出现于笔记小说中，正史反而少有记述，只有《旧唐书》有相关的记载。《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传》序云：

开元、天宝中，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皇子十宅院，皇孙百孙院，东都大内、上阳两宫，大率宫女四万人。（刘昫等撰，1975:4754）

唐玄宗拥有庞大的后宫，令人不禁膛目结舌，与历代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除此之外，玄宗自册封杨氏为贵妃后，更是专宠贵妃，甚至为了她穷奢极侈。《旧唐书》的《后妃传》云：

韩、虢、秦三夫人岁给钱千贯，为脂粉之资。钁授三品、上柱国，私第立戟。姐妹昆仲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宫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逾千万计，见制度宏壮于己者，即车而复造，土木之工，不舍昼夜。玄宗颁赐及四方献遗，五家如一，中使不绝。开元以来，豪贵雄盛，无如杨氏之比也。玄宗凡有游幸，贵妃无不随侍，乘马则高力士执辔授鞭。官

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熔造，又数百人。杨、益、岭表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异服，以奉贵妃献贺，因致擢居显位。玄宗每年十月幸华清宫，国忠姐妹五家扈从，每家为一队，著一色衣，五家合队，映照如百花之焕发，而遗钿坠舄，瑟瑟珠翠，璀璨芳馥于路。（刘昫等撰，1975：2179）

《旧唐书》对于玄宗沉迷声色导致的穷奢极侈，着墨得比较多。从这一时期与开元前期焚烧珠玉于殿前相比，简直判若两人，差别极巨。此外，虽说玄宗在这一时期浸淫于享乐，《旧唐书》的《玄宗本纪》下却有他人情味的一面，文中云：

凌晨自延秋门出，微雨沾湿，扈从惟宰相杨国忠、韦见素、内侍高力士及太子，亲王，妃主、皇孙已下多从之不及。平明渡便桥，国忠欲断桥，上曰：“后来者何以能济？”命缓之。（刘昫等撰，1975：232）

玄宗在逃命之时，不忘想到留一条生路给他的黎民百姓，在帝王世家，的确少见。但是这一记述，却只见于《旧唐书》，并不见于《新唐书》。在《安禄山事迹》的记载中，也和此条相符。唐玄宗阻止了杨国忠断桥，并说：“今百姓仓惶，各求生路，何得断绝！”（姚汝能撰、曾贻芬点校，2006：104-105）从对话上看，笔记小说中的玄宗显然被平民化，但是大体上与《旧唐书》并无出入。关于次马嵬事件，两唐书都有记载。《旧唐书》的《玄宗本纪》下云：

次马嵬驿，诸卫顿军不进。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奏曰：“逆胡指阙，以诛国忠为名，然中外群情，不无嫌怨。今国步艰阻，乘兴震荡，陛下宜徇群情，为社稷大计，国忠之徒，可置之于法。”会吐蕃使二十一人遮国忠告诉于驿门，

众呼曰：“杨国忠连蕃人谋逆！”兵士围驿四合。及诛杨国忠、微方进一族，兵犹未解。上令高力士诘之，回奏曰：“诸将既诛国忠，以贵妃在宫，人情恐惧。”上即命力士赐贵妃自尽。（刘昫等撰，1975：232）

《旧唐书》将当时的情况转述出来，让后世之人有更丰富的史料作为依据进行研究，可《新唐书》的《玄宗本纪》下则仅记载左龙武大将军杀杨国忠等人，并赐贵妃杨氏死。（欧阳修、宋祁撰，1975：152）《新唐书》以《春秋》笔法贯穿整部史书，简略是首要条件。若果仅参考《新唐书》，将难进行考证，因为过于简略，没有其他依据能够衍生探讨或研究。近代学者彭菊媛也认为，用《春秋》笔法褒贬史事人物，容易与事实有抵触。（彭菊媛，2008:14）这不仅与事实容易有抵触，更容易产生偏颇的现象，使研究的学者不能够以客观的资料作出分析与结论。

纵观上述所论，新旧《唐书》没有大相径庭的差别。赵翼也说：“《新唐书》与《旧唐书》大多大同小异，不过《新唐书》‘删其芜词而补其未备，无有大相径庭者’”（赵翼撰、曹光甫校点，2009:303）虽说如此，两唐书却也在本质上有不同。不同之处可以分为三个部分：详略之别、内容之别与史观之别。

上述所论证的详略与内容之别，之所以产生，主要是因为史观之别。曾公亮的《进唐书表》就提及修撰《新唐书》的原因，他认为《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并且“不得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不可以垂劝诫、示久远”。（欧阳修、宋祁撰，1975：6471）北宋张方平也认为应节略《旧唐书》纪传中的事迹，以期“善者可以为准，恶者可以为鉴戒”。（张方平著、郑涵点校，2000：288）这说明了当时宋代人对《旧唐书》的普遍看法，也确立了两书的立场不同。

第三章 唐玄宗知人善任的形象

《旧唐书》的史臣点评开元时期的唐玄宗曰：“爱之以慈俭，律之以轨仪、焚后庭之玩，戒其奢也。庙堂之上，无非经济之才；表著之中，皆得论思之士。”

（刘昫等撰，1975:236）对于此一评价，《新唐书》的史臣不见得如此认为，但是内容中是否提及？以及唐五代小说是否和《旧唐书》的观点一样？这些疑问使这一课题充满讨论性。笔记小说在唐代非常盛行。许多笔记小说的作者都是秉持着补正史之不足的主旨在创作。（王珂著，2007:14）而吴缜批评《新唐书》过多取材于唐人小说，认为这些历史事实是靠不住的。（吴缜撰，2005:4）

笔者依循以上的疑问及历代学者对两《唐书》不同的评价，在接下来的两个章节，以唐五代笔记小说深入探讨两《唐书》对玄宗不同的观点，并从四个事件，即“蝗虫事件”、“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节俭治国”及“废寝忘食”，企图厘清笔记小说和正史之间的关联。

第一节 “蝗虫事件”

唐玄宗的“知人善任”形象，可以从姚崇“捕蝗事件”中体现出来。此事件都记载于新旧《唐书》的《姚崇列传》当中。而笔记小说方面，也可详见于《开天传信记》及《唐语林》一书中。（王谔撰、周勋初校证，2008:56）《开天传信记》是郑縈所撰，确切撰写日期不明，但是郑縈于昭宗时曾拜相，于昭宗光化二年

(899) 卒 (郑綮撰、丁如明校点, 2000:1221) 由此可断定最早记载此事件的是《开天传信记》, 原文云:

开元初, 山东大蝗, 姚元崇请分遣使捕蝗埋之。上曰: “蝗, 天灾也, 诚由不德而致焉。卿请捕蝗, 得无违而伤义乎?” 元崇进曰: “臣闻《大田》诗曰‘秉畀炎火’者, 捕蝗之术也。古人行之于前, 陛下用之于后, 古人行之, 所以安农; 陛下行之, 所以除害。臣闻安农, 非伤义也, 农安则物丰, 除害则人丰乐, 兴农去害, 有国之大事也, 幸陛下熟思之。” 上喜曰: “事既师古, 用可救时, 是朕心也。” 遂行之。时中外咸以为不可, 上谓左右曰: “吾与贤相讨论已定, 捕蝗之事, 敢议者死!” 是岁所司结奏捕蝗凡百余万石, 时无饥馑, 天下赖焉。(郑綮撰、丁如明校点, 2000:1223)

这一笔记载是笔记小说中出现得最早的, 甚至早于新旧《唐书》。而后晋所著的《旧唐书》关于这一条的记述, 内容大致相同。当中的姚崇皆引用了毛诗“秉彼蠹贼, 付畀炎火”, (刘昫等撰, 1975:3024) 这在《新唐书》亦有描述。可是笔记小说中, 对玄宗的描绘, 并不像新旧《唐书》般。在《开天传信记》, 当姚崇提出方法意图歼灭蝗虫时, 玄宗的反应是欣喜并公开许可的, 这从“事既师古, 用可救时, 是朕心也”及“吾与贤相讨论已定, 捕蝗之事, 敢议者死”(郑綮撰、丁如明校点, 2000:1223) 中能明显看出。可是在新旧《唐书》中, 并没有看见玄宗对姚崇的积极认可, 反而是抱着怀疑的态度质疑姚崇, 经过姚崇的一番解释, 曰:

庸儒执文, 不识变通。凡是有违经而合道者, 亦有反道而适权者。昔魏时山东有蝗伤稼, 缘小忍不除, 致使苗稼总尽, 人至相食; 后秦时有蝗, 禾稼及

草木俱尽，牛马至相啖毛。……若除不得，臣在身官爵，並请剔除。”上许之。（刘昫等撰，1975:3024）

在《新唐书》中也有这一记载，除了遣词用句的不同，大意是完全一样的。唯有最后一句，《新唐书》的记载是以“且讨蝗纵不能尽，不愈于养以遗患乎”。

（欧阳修、宋祁撰，1975：4384）《旧唐书》中，姚崇是以自己的官位作为担保，而《新唐书》姚崇则以疑问句解决玄宗的疑问。但玄宗的态度在两《唐书》中使一致的。当中都表明了玄宗怀疑的态度，并且是让姚崇姑且一试，并不如《开天传信记》般对姚崇是绝对的信任。以时间线上，《开天传信记》先于两《唐书》，正史是否参考了笔记小说，具有争议性。

全唐文认为此一笔记小说的作者为唐玄宗朝代时人郑棨，并非唐朝晚期的郑綮。因而后来有学者以此为根据，认为此笔记小说的作者郑棨是初唐的人，与两《唐书》中有传的郑綮没有关系。（李斌诚，2002：228）但经过后来学者贺金娥的考证，断定《开天传信记》的作者为晚唐的郑綮，而非初唐的郑棨。（贺金娥，2004：20）虽有“棨”、“綮”相通的说法，但经过周勋初的分析，也认为郑棨与郑綮当系二人。（周勋初，2000：364）经过多位学者的考证，有助于了解《开天传信记》的材料来源不是从第一手资料，也就是从唐玄宗时期而得来。经贺金娥的分析，此笔记小说的资料来源为三个层面：有关玄宗的杂记小说、碑刻及传闻。（贺金娥，2004:21-22）虽说周勋初也认为《开天传信记》中的某些记述，包括姚元崇议除蝗，是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的（周勋初，2000:364）但这并不表示，两《唐书》对此记载铁定参考了笔记小说。如上述所论，《开天传信记》与两《唐书》的记载大体上一

致，但当中，玄宗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从这可推断出，正史引用笔记小说甚一，而非唯一。

第二节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唐玄宗“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态度，在正史或是笔记小说中，都能追溯，尤其是对姚崇的信任，更能在《次柳氏旧闻》中寻得。玄宗对姚崇信任的程度，不仅在《次柳氏旧闻》中有记载，《新唐书》的《姚崇列传》中也有相关记载，反而是翻找全本《旧唐书》，不见此条目的记述。当中的关联为何，笔者将于此探讨。

唐玄宗对于姚崇的信任已经达到什么程度，在《次柳氏旧闻》就有一番记载。文中云：

玄宗初即位，体貌大臣，宾礼故老，尤注意于姚崇、宋璟，引见便殿，皆为与之，去则临轩以送。其他宰臣，优宠莫及。至李林甫以宗室近属，上所援用，恩意甚厚，而礼遇渐轻。姚崇为相，尝于上前请序进郎吏，上顾视殿宇不注，崇再三言之，翼上少售，而卒不对。崇益恐，趋出。而高力士奏曰：“陛下初承鸿业，宰臣请事，及当面言可否。而崇言之，陛下不视，臣恐宰臣必大惧。”上曰：“朕即任崇以庶政，事之大者当白奏，朕与共决之；如郎署吏秩甚卑，崇独不能决，而重烦吾耶？”崇至中书，方悸不自安。会力士宣事，因为言上意，崇且解且喜。朝廷闻着，皆以上有人君之大度，得任人之道焉。（李德裕编、丁如明校点，2000:465）

《次柳氏旧闻》是李德裕所撰。李德裕在穆宗即位时，提拔为翰林学士，而且还是宰相李吉甫的儿子，因此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朝廷，了解朝廷运作。因缘际会下，李德裕从父亲口中得知高力士的事迹，所以《次柳氏旧闻》以高力士的角度为出发点，多记述高力士的所见所闻所说。（李德裕编、丁如明校点，2000:463）李德裕为穆宗时人，而高力士则为玄宗时人，当中的年份有一段差距。李德裕所谓以高力士口述为记载，实经过了几人之口辗转传达给李德裕知，这当中是否有增删补阙，是值得探讨的。

高力士曾先后向两人追述朝政，一为大理司直郭湜，二为史馆修撰柳芳。（李云，2003:93）李德裕之父李吉甫与柳芳之子刘冕同为尚书郎，又同遭贬谪，“道相与语，遂及高力士之说”（李云，2003:93）这就说明了李德裕对高力士口述的资料来源自柳芳，但却经过了三人之口才传达至李德裕口中。当中不论是相隔的时间还是口述之人，都有可能使高力士口述的事实偏离。

《新唐书》编于《次柳氏旧闻》之后，当中亦有此一条目的记载，而两者是否有关联，《新唐书》曾参照《次柳氏旧闻》是笔者意欲厘清的。《新唐书》的《姚崇列传》云：

崇尝于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顾，不主其语。崇惧，再三言之，卒不答，崇趋出。内侍高力士曰：“陛下新即位，宜与大臣裁可否。今崇及言，陛下不应，非虚怀纳谏者。”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当与决，至用郎吏，崇顾不能而重烦我耶？”崇闻乃安。由是进贤退不肖而天下治。（欧阳修、宋祁撰，1975：4384）

高力士是何许人也，他的叙述又是否有参考的价值，这是首要问题。高力士是唐玄宗非常信任的对象，这种信任是基于唐玄宗深思熟虑的结果。唐玄宗考虑到“刑余之人”是没有办法当皇帝的，并且宦官是家奴，既贴近又恭顺听话。（黄永年，1998：404）再者，高力士在玄宗夺权之时，参与其中，帮助玄宗歼灭太平公主，证明了高力士的能力。唐玄宗因此而非常信任高力士，甚至让他协助处理政务，《旧唐书》的《高力士传》就有这一段记载：“每四方进奏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刘昫等撰，1975：4757）所以高力士参与的政治活动是非常广泛的，他的叙述也就会有历史价值。

两文相较之下，当中所叙述之事相同，《新唐书》参照《次柳氏旧闻》，似可成立。但前者提及，高力士曾向两人追述朝政，除了柳芳，还有一者为郭湜。郭湜与高力士均遭贬谪至巫州，途中与高力士相识并从其口中得知朝中之事。并提笔著书，命名《高力士外传》。（郭湜，1985：122）而李德裕虽在自序中说《次柳氏旧闻》“彼皆目睹，非出传闻，信而有征，可为实录。（李德裕编、丁如明校点，2000：464）而周勋初经考证证实了李德裕在记载之时，有向他人核对资料，可还是有与事实出入的地方。（周勋初，2000：367）相比之下，《高力士外传》真实可靠的程度，远在辗转得来史料的《次柳氏旧闻》之上。因此赵翼也认为，玄宗对姚崇之信任的史料来源皆多采《高力士外传》，因“其为杂史之中信而可征者”。

（赵翼著，王树民点校，2005：371）以此，笔者推断《次柳氏旧闻》与《新唐书》的史料来源应同出一处，并非互相参照。从中也能证实玄宗信任姚崇的形象，是得到唐朝大臣认可的。

至于《旧唐书》全文都不见此一记载，与《旧唐书》对高力士的评价有一定的关系。《旧唐书》本传将安史之乱的发生间接归咎于高力士，认为高力士是原因之一。文中曰：“力士谨慎无大过，然自宇文融以下，用权相噬，以紊朝纲，皆力士之由。”（司马光著，1956：4758）《旧唐书》将安史之乱及唐朝从此走向衰败的缘由归咎于高力士，当中不见以高力士及玄宗对话为主的此一条目实属情理之中。

除上述所论，唐玄宗知人善任的形象，在笔记小说中亦斑斑可考。尤其是从给予姚崇及宋璟高度肯定，间接肯定了玄宗这位伯乐的眼光，以发挥他们的功能，造就“开元盛世”的景象，同时也成就了玄宗知人善任的形象。《隋唐嘉话》云：

今上既诛韦氏，擢用贤俊，改中宗之政，依贞观故事，有志者莫不想望太平。中书令元之、侍中璟、御史大夫构、河南尹杰，皆一时之选，时人称姚、宋、毕、李焉。（刘餗撰、恒鹤校点，2000:112）

《隋唐嘉话》的作者刘餗乃史家刘知几之子，曾在朝为史官，监修国史。（刘餗撰、恒鹤校点，2000:89）高度评价不仅对姚崇及宋璟，还有毕构和李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姚崇和宋璟的评价被提高至另一高度。《大唐新语》云：

崇善应变，故能成为天下之务；璟善守文，故能持天下之政。二人执性不同，同归于道。叶心翼赞，以致刑措焉。（刘肃撰、恒鹤校点，2000:215）

《隋唐嘉话》成书期已不可考，鉴于刘餗为天宝初（742）为官，此书大约著于这个时期，是可以肯定的。而《大唐新语》著于元和亥年（807），两书相差将近半个世纪，从中可以察觉后来学者有意将姚崇宋璟的形象提高，并模糊毕、李的

形象。此一举动不但能够将姚崇宋璟的形象抬高，同时也突出了玄宗知人善任的形象，而且关于姚崇宋璟的故事，是更多也更容易发挥。

此外，玄宗对宋璟的态度，在《开元天宝遗事》上有记载，文中云：

宋璟为宰相，朝野人心归美焉。时春御宴，帝以所用金箸令内臣赐璟。虽受所赐，莫知其由，未敢陈谢。帝曰：“所赐之物，非赐汝金，盖赐卿之箸，表卿之直也。”璟遂下殿拜谢。（王仁裕撰、丁如明校点，2000:1716）

玄宗深知宋璟是难得的良相，因此赐以金箸以表宋璟之直。除了点出宋璟是良相，玄宗慧眼识大臣外，同时也表达了玄宗的感恩之心。一位感性的皇帝，是难得一见的，在朝政上更能收买大臣的心。唐五代笔记小说的作者们，多是曾在朝为官的唐朝臣子，对于玄宗有此一评价，进而将玄宗塑造成此一形象，虽经过时间的演变，却也不离此一形象，就显得非常合理。

第四章 唐玄宗励精图治的形象

唐玄宗在开元时期，表现出了高度的雄心，一心一意想将国家推向一个繁荣似锦、平民安居乐业的盛世。在后人给予这个时期“开元之治”或“开元盛世”的封号，说明了唐玄宗的确做到了他所下的目标。唐玄宗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一目标，除了知人善任之外，就是励精图治了。

第一节 “节俭治国”

开元初期，唐玄宗与贤相们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企图通过改革将唐朝从韦后乱政以及边疆不断被犯境的忧虑回复过来，让百姓们回复安宁太平的日子。这时的玄宗为了节俭，做出了一项为人津津乐道的事情，就是将金银珠玉焚烧于殿前，以坚定节俭的态度。此一事件不仅记录在《旧唐书》，《新唐书》中也有相关记载。《旧唐书》云：

二年六月丁巳，内出珠玉锦绣等服玩，又令于正殿前焚之。（刘昫等撰，1975：173）

《新唐书》亦云：

二年七月乙卯，焚锦绣珠玉于殿前。戊戌，禁采珠玉及为刻镂器玩、珠绳帖縠服者，废织锦坊。（欧阳修、宋祁撰，1975：123）

这两段原文都叙述了玄宗焚烧锦绣珠玉于殿前，可是在时间点上是有出入的。一个朝廷何其大，再者，后宫嫔妃众多，焚烧锦绣珠玉岂是一次就能够完成的事情。

因此笔者推断，焚烧事件不仅发生过一次，因此在两《唐书》的记载当中，才会导致时间上有出入。从此更能看出玄宗节俭的决心是坚定的，而不是只做表面功夫，沽名钓誉的作为。此外，《新唐书》还增了严禁采珠玉者及制作雕刻器玩，并废除了织锦坊。这突显了玄宗节俭的形象，不仅焚烧锦绣珠玉，还严禁奢侈风气。这能够有效控制民间奢侈的作风，并且以最高统治者及宫廷开始，绝对能够让百姓心服口服地服从此项禁令。在笔记小说中，《隋唐嘉话》也有此类记载。文中云：

开元始年，上悉出金银珠玉锦绣之物于朝堂，若山积而焚之，示不復御用也。

（刘餗撰、恒鹤校点，2000:113）

以年份排列，最早记载此事的笔记小说为撰于天宝时期的《隋唐嘉话》，而宋王谠所撰的《唐语林》有引用这条。（王谠撰、周勋初校证，2008：107）此一记载也出现于《续世说》中。《续世说》的作者为北宋的孔平仲，于治平二年（1065）至崇宁元年（1103）在朝为官，著《续世说》年份已不可考，但根据他在朝为官的年份，《续世说》被推断在此前后著。而《新唐书》著于嘉祐五年（1060）完成，因此《续世说》的记载并没有影响《新唐书》的嫌疑。

《隋唐嘉话》的作者刘餗身为刘知几的儿子，生于史学家庭，自己也是著名的史家（周勋初著，2000：330），可以从此推断《隋唐嘉话》的史料价值之高。再者，刘餗任职史馆，看到《实录》及其他史料是再正常不过。刘餗虽将社会广泛流传的一些异说撰于书中，这也是因为他有意藉此与正史有所区别，也是史书体例严正有法的表示。（周勋初，2000：330-331）故刘餗在《隋唐嘉话序》中言：“余自髫髻之年，便多闻往说，不足备之大典，故系之小说之末。”（刘餗撰、恒鹤校

点，2000：92）刘餗虽有意与正史作区分，可他的本意还是要让此书的性质接近历史著述，以补史之阙。（严杰著，2009：24-25）从这点上看，小说的内容大体上还是可信的。

经周勋初的考证，此书的内容曾为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所吸收，而笔记小说中也有《大唐新语》采择沿用当中的记载，李肇也续此而作《国史补》，甚至《唐语林》及《续世说》都沿用此书的记载。（周勋初，2000：331）从上述所论，不排除两《唐书》参考了《隋唐嘉话》中的记载，作为史料来源之一。在史料价值上，这一事件也能够达到劝诫历代皇帝，节俭的重要性。

唐玄宗节俭的形象，在笔记小说中虽较少，反而是《旧唐书》记载了玄宗有关节俭的诏令。文中云：

二年九月甲寅，制曰：“自古帝王皆以厚葬为戒，以其无益亡者，有损生业故也。近代以来，共行奢靡，递相仿效，浸成风俗，既竭家产，多至凋弊。然则魂魄归天，明精诚之已远；卜宅于地，盖思慕之所存。古者不封，未为非达。且墓为真宅，自便有房，今乃别造田园，名为下帐，又冥器等物，皆竞骄侈。失礼违令，殊非所宜；戮尸暴骸，实由于此。承前虽有约束，所司曾不申明，丧葬之家，无所依准。宜令所司据品令高下，明为节制：冥器等物，仍定色数及长短大小；园宅下帐，并宜禁绝；坟墓塋域，务尊简俭；凡诸送终之具，并不得以金银为饰。（刘昫等撰，1975:174）

唐玄宗不仅在殿前焚烧珠玉，也下令全国对丧葬的规范，从中看出玄宗积极于节俭。当时玄宗刚摆平韦后，不久又摆平太平公主的党羽；边疆亦不断传来蛮夷犯

境的消息。玄宗有此节俭行为，显得合理，后来学者在研究唐朝历史时，也认可了唐玄宗的治世成就在于崇尚节俭。（高明士等编著，2006：208）从笔记小说与正史的互相对照，可见玄宗的节俭是确有其事，并不是唐人一厢情愿的想象。

第二节 “废寝忘食”

唐玄宗的励精图治体现在几项各种不同的方面。前面提及的节俭，再者就是为了治理国家而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在《明皇杂录》中就有此记载，云：

开元中，上急于为理，尤注意于宰辅，常欲用张嘉贞为相，而忘其名。夜令中人持烛于省中，访直宿者为谁，还奏中书侍郎韦抗，上即令召入寝殿。上曰：“朕欲命一相，尝记得风标为当时重臣，今为北方诸伯，不欲访左右，旬日念之，终忘其名，卿试言之。”抗奏曰：“张齐丘今为朔方节度。”上即令草诏，仍令官人持烛，抗跪于御前，援笔而成。上甚称其敏捷典丽，因促命写诏敕。抗归宿省中，上不解衣以待旦，将降其诏书。夜漏未半，忽有中人复促抗入见。上迎谓曰：“非张齐丘，乃太原节度张嘉贞。”别命草诏。上谓抗曰：“维朕志先定，可以言命矣。适朕因阅近日大臣章疏，首举一通，乃嘉贞表也，因此洒然方记得其名，此亦天启，非人事也。”上嘉其得人，复叹用舍如有人主张。（郑处海撰、丁如明校点，2000:955-956）

此条所记载的虽是唐玄宗为命张嘉贞为相，在一夜急召韦抗两次入宫草拟诏书的故事。但从中也能够看出玄宗的勤政形象。当中一句“适朕因阅近日大臣章疏”

说明了玄宗不是在半夜突然兴起想到要命人为相，而是他在半夜三更依然在批阅奏章。玄宗的勤政程度，已经到达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在《新唐书》中，《张嘉贞》列传也提及，云：

及宋璟等罢，帝欲果用嘉贞，而忘其名。也诏中书侍郎韦抗曰：“朕尝记其风操，而今为北方大将，张姓而复名，卿为我思之。”抗曰：“非张齐丘乎？今为朔方节度使。”帝即使作诏以为相。夜且半，因阅大臣表疏，举一则嘉贞所献，遂得其名，即以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欧阳修、宋祁，1975：）

《明皇杂录》的作者乃唐代的郑处海，他在大和八年（834）考取进士，此书是他在朝为官较书郎时所撰。（郑处海撰、丁如明校点，2000：953）于此，《明皇杂录》面世早于《新唐书》。《新唐书》是否沿用《明皇杂录》，历代学者均有考究。严杰在《明皇杂录考》中提及，司马光所撰《资治通鉴》，玄宗朝事有十几处与《明皇杂录》条文相合，因而断定这些条目均采用《明皇杂录》。（严杰著，2009：126）但当中并未提及《新唐书》有采用《明皇杂录》的现象。周勋初的《唐代笔记小说叙录》中亦未有此论述。反而是贺金娥在《有关唐玄宗的三种杂记考述》中提及《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大量采用了《明皇杂录》。（贺金娥，2004：9）笔者对此论述不敢苟同，章群按传记考证《新唐书》是否引用笔记小说，在张嘉贞此一条目中，结果是肯定的。但是章群亦提及，《实录》流传于外的可能性是有的，因此笔记小说的作者是否曾参照《实录》而记载也是有其可能性存在。（章群著，1999：33）于此，正史引用笔记小说有其可能性，但也有另一个可能性，

也就是正史和笔记小说同出一源。笔者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两者定有关联，所以才会出现以上的记载大体相同的情形出现。

虽无法肯定《新唐书》是否参照笔记小说，但以这两书均有记载的情况而论，唐玄宗因公忘私的形象是可以确定的。并且玄宗不仅因公而废寝忘食，本身也是非常孜孜不倦。根据《旧唐书》的记载，玄宗常览阅史籍，遇到不明的地方，还会不耻下问。文中云：

三年冬十月甲寅，制曰：“朕听政之暇，常览史籍，事关理道，实所留心，中有阙疑，时须质问。宜选耆儒博学一人，每日入内侍读。”（刘昫等撰，1975：175）

开元初期，唐玄宗是一位雄心万丈的君主，适逢年轻力壮，热血澎湃，意欲将唐朝治理得井井有条。玄宗也很清楚，通过学问，能够更轻易地治理他的帝国，因此虽劳心劳力于朝政，仍然不忘求学问。这是非常值得嘉奖的。在《开元天宝遗事》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文中云：

明皇忧勤国政，谏无不从，或有章疏规讽，则探其理道优长者贮于金函中，日置于右，时取读之，未尝懈怠也。（王仁裕撰、丁如明校点，2000：1739）

唐玄宗的举动表现出宽宏大量的胸襟，而且不仅“谏无不从”还“贮于金函”，“时取读之”。这和《旧唐书》中所言的有所出入，但是这两件事都不约而同地说明，唐玄宗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帝王，很有进取心。而这一形象是非常深入民心，进而记载于笔记小说，甚至是五代及宋代的正史上。

除了正史和笔记小说证明了唐玄宗励精图治的形象，当时的情景也是证明玄宗形象的有力证据之一。《新唐书》的《食货志》云：“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欧阳修、宋祁撰，1975：1346）《开天传信记》亦云：

开元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旦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其瑞叠应，重译膺至，人情欣欣然，感登岱告成之事。上犹惕励不已，为让着数四焉。（郑纂撰、丁如明校点，2000:1223）

唐玄宗面对内忧，即与韦后、太平公主的斗争，及外患也就是陆续遭到蛮夷犯境，都没有使整个唐朝陷入水深火热的状态，还在短短几年内即达到歌舞升平的境界，这确实该归功于唐玄宗。经黄永年的研究，唐太宗贞观时仍不满300万户口，到开元二十年（732）是786万户，天宝元年（742）是834万户口，而这些户口是登记在案的，还没有包括少报户口的人民。（黄永年，2007：54-55）从这数据看，玄宗开元时期的富庶是远远超过高祖和太宗，这也是唐玄宗励精图治的有力证据。唐玄宗对于这样的结果，当然是满意的，而且还感到相当地自豪。在开元十三年，玄宗封禅之际的坦荡就宣示了这一点。《大唐新语》云：

开元十三年，玄宗既封禅，问贺知章曰：“前代帝王，何故秘玉牒之文？”

知章对曰：“玉牒本通神明之意。前代帝王所求各异，或祷年算，或求神仙，

其事微密，故外人莫知之。”玄宗曰：“朕今此行，皆为苍生祈福，更无私请，宜将玉牒示百寮。”（刘肃撰、恒鹤校点，2000：335-336）

唐玄宗的一句“为苍生祈福”完全收复了当时“百寮”的心。姑且不论玄宗此一举动的背后意义，当下得到了比预期中还要好的效果，是铁一般的事实。而且这也证明了唐玄宗对于自己的努力还是非常肯定的，认为自己无愧于天，更无愧于祖先及社稷。因此才有“将玉牒示百寮”的举动。王仲犛在《隋唐五代史》中说到：“唐玄宗即位之初极力效仿曾祖父唐太宗的“励精图治”，因此开元时期的政治是清明及有朝气的。”（王仲犛，2007：147）这间接肯定了唐玄宗的勤政形象。纵观上述，历史事实为唐玄宗证明了他在开元时期，励精图治的形象，而非仅是唐五代笔记小说的作者们对唐玄宗的美好想象，亦非形象嬗变而导致的结果。

结论

本论文透过梳理新旧《唐书》中，唐玄宗于开元时期的形象，从中发现新旧《唐书》的本质上有根本的不同，当中包括史观及详略的差别。两《唐书》对唐玄宗的评价建立于不同的史观，《旧唐书》认为唐玄宗是“用人之失”，而《新唐书》认为“女祸”导致“安史之乱”。这是因为《新唐书》主要是朝“暴恶以动人耳目”及“扬善以垂劝戒”的思想编撰。为了与这两个思想符合，《新唐书》的作者们不惜尽削诏令，甚至损害史事的真实程度。（谢保成，2009：515-521）虽然此等损害并没有严重到将历史改写，但也导致史传的局限性。《剑桥中国隋唐史》也提及，史传是以朝廷为中心的记录。从事官方史书的编修更可以说是一种有意识的政治行动。（崔瑞德编，1990：36）虽然史书是具有潜在政治意义的一种写作方式，但两《唐书》对唐玄宗形象的描写都均有概述其中。

笔者发现，两《唐书》之中玄宗形象的嬗变与唐五代笔记小说是有关联性的，因历代学者认为《新唐书》有参照笔记小说的嫌疑。唐五代笔记小说，虽说是唐代学者们所撰，离唐代最接近，也最接近唐玄宗的形象，但小说仍然不离小说本质，其中应有虚构的成分。再者，作者们虽说“取其必实之迹”（李潜编、阳羨生校点，2000:1212）但文中是否加入主观意识，或者有其他因素导致记载偏离事实，这些都需要考证。为了使本论文的论述更加全面，笔者亦从唐五代笔记小说中着手，从唐玄宗在开元时期的四个事件中与史传比照。

从以上四个事件的论述中，笔者发现唐玄宗形象的记载，是基于两点的：史料来源及撰写者的目的和考量。《新唐书》确有参考笔记小说，但这仅是资料来源之

一，其他的来源还包括国史，《实录》等其他管道。况且，当时流传的情况极为复杂，资料来源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群能够查阅而已，因此并不能断定两《唐书》对玄宗形象的记载就是摘取自笔记小说。至于撰写者的目的和考量，尤其是两《唐书》的史观立场，导致玄宗形象的嬗变。至于笔记小说方面，虽然撰写笔记小说的作者们对玄宗形象的掌握是非常有自信的，但经过后来学者的考证，当中的确有不实之处，甚至有夸大其言的嫌疑。基于这种官方及非官方的缺陷，一经参照互相补阙辩证，就能够确立唐玄宗的形象。唐玄宗在开元时期的形象虽经嬗变，在细微之处呈现不同的面貌，但以整体的形象而言，并没有根本上的转变。因此唐玄宗在开元时期的“知人善任”及“励精图治”的形象，是毋庸置疑的。

参考文献

(一) 古籍引用

1. [后晋] 刘昫等撰（1975），《旧唐书》，中华书局。
2. [清] 王鸣盛编、黄曙辉点校（2005），《十七史商榷》，上海书店出版社。
3. [清] 赵翼撰、曹光甫校点（2011），《陔餘丛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4. [清] 赵翼撰、王树民校证（2005），《二十二史札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
5. [宋] 欧阳修、宋祁撰（1975），《新唐书》，中华书局。
6. [宋] 司马光著（1956），《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
7. [宋] 王谠撰、周勋初校证（2008），《唐语林校证》，中华书局。
8. [宋] 吴缜撰（2005），〈新唐书纠谬〉，《钦定四库全书荟要》，长春：吉林出版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 [宋] 张方平著、郑涵点校（2000），《张方平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0. [唐] 郭湜（1985），《高力士外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1. [唐] 李潜编、阳羨生校点（2000），〈松窗杂录〉，《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

12. [唐] 刘肃撰、恒鹤校点（2000），〈大唐新语〉，《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
13. [唐] 刘餗撰、恒鹤校点（2000），〈隋唐嘉话〉，《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
14. [唐] 姚汝能撰、曾贻芬点校（2006），〈安禄山事迹〉，《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
15. [唐] 郑縈撰、丁如明校点（2000），〈开天传信记〉，《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
16. [五代] 王仁裕撰、丁如明校点（2000），〈开元天宝遗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专书

1. 崔瑞德编（1990），《剑桥中国隋唐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 高明士等编著（2006），《隋唐五代史（增订版）》，台北市：里仁书局。
3. 胡戟等主编（2002），《二十世纪唐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 黄永年（1985），《旧唐书与新唐书》，北京：人民出版社。
5. 黄永年著（1998），《唐代史事考释》，台北市：联经出版社。
6. 黄永年（2007），《唐史十二讲》，北京：中华书局。
7. 李斌诚主编（2002），《唐代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8. 王仲犛（2007），《隋唐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

9. 谢保成著（2007），《隋唐五代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10. 许道勋、赵克尧著（1995），《唐玄宗传》，北京：人民出版社。
11. 严杰著（2009），《唐五代笔记考论》，北京：中华书局。
12. 袁英光、王界云著（1987），《唐明皇传》，天津：人民出版社。
13. 章群著（1999），《通鉴、新唐书引用笔记小说研究》，台北市：文津出版社。
14. 周勋初著（2000），〈唐人笔记小说考索〉，《周勋初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
15. 周勋初著（2000），〈唐人笔记小说叙录〉，《周勋初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

（三）硕士论文

1. 贺金娥（2004），《有关唐玄宗的三种杂记考述—〈次柳氏旧闻〉、〈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 彭菊媛（2008），《新唐书“本纪”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 唐凤霞（2006），《新唐书的编纂及其学术成就》，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4. 王珂（2007），《追忆、反思与怀想——唐代明皇题材小说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四）期刊论文

1. 李云（2003），〈唐高力士传记资料辨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2. 谢保成（2009），〈关于《新唐书》思想倾向考察〉，《新旧唐书与新旧五代史研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